

# 郭沫若研究会报

郭沫若·周作人交流特刊

第20期(总21期)中文简辑版

2019年7月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事務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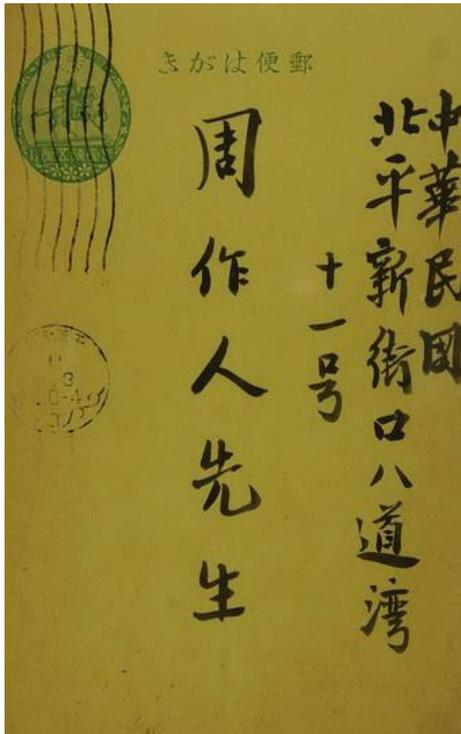
日本 福冈市中央区谷 2-20-8-311(岩佐内)

☎ &FAX: 81-92-715-2554 E-mail :

## 目 录

- 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致周作人的贺年片／释文：郭平英……………2
- 公开郭沫若致周作人贺年片的本刊谢辞／日本郭沫若研究会……………3
- 不可多得的明信片／郭平英……………4
- 关于郭沫若致周作人的贺年明信片／周吉宜……………5
- 从郭沫若致周作人的明信片读出的史事／蔡震……………6
- 《丙子の字に就て》（《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蔡震……………8  
付：蔡震有关两人交流的史料性文章／编辑部选编
- 《周作人拜访郭沫若》（《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9
- 有关郭沫若与周作人交流的一些史料(存目)
- 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
- 书信／郭沫若1934年致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的书简·郭沫若1932年致容庚的书简
- 论文：知堂·周作人与鼎堂·郭沫若／吴红华……………10
- 论文(只存题目)
- 知堂与鼎堂／刘岸伟 ■两堂交流三十年／武继平 ■一九三四年周郭会面的背景／中里见敬 ■小诗运动的挫折 读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午的话语／顾伟良
- 作者介绍……………14

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致周作人的贺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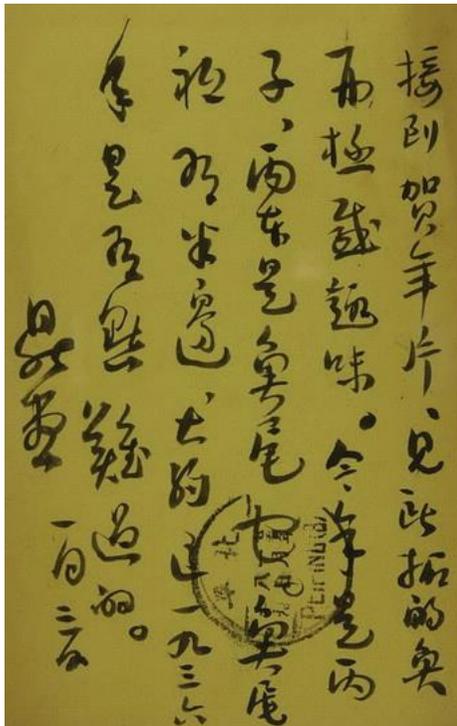


注 释

\*贺年片封面未注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盖有「千叶市川／3／0-4」的邮戳。

\*本文盖有「北京一月八日」的邮戳。

\*文中出现的「鱼拓」「丙」等文字，第 页有蔡震的释文(《丙子の字に就て》)。请参照。



释 文 (郭平英)

接到賀年片，見所拓的魚形極感趣味。今年是丙子，丙本是魚尾也。魚尾只有半邊，大約這一九三六年是有点難過的。

鼎堂 一月三日

## 公开郭沫若致周作人贺年卡的本刊谢辞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

本会发刊的《郭沫若研究会报》上有幸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致周作人的一张珍贵的贺年片，我们感到特别的兴奋。郭沫若与周作人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两位巨人。以前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点不同，加之没有直接交往的一手资料，所以几乎没有论及两位直接交流的论文。这次我们弄清了两之间曾寄送过贺年片的事实，这意味着这两位作家的研究可能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进展。所以本会编辑深感责任重大。

这次承蒙周吉宜（周作人长孙、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和郭平英（郭沫若的女儿、著作授权人、前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长）两位的厚意，感谢他们对本会的信任和关照，我们把他们特意惠寄的保存贺年片的说明文字，编排在本刊卷首。

为了不辜负两位的信任以及对本刊的支持，我们搜集了各种交流文献资料，并向有关研究人员征稿，终于特组了《郭沫若·周作人两位文坛巨人交流专号》，这期刊物如果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契机，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吴红华 翻译）

# 不可多得的明信片

郭平英

今年春节过后不久收到岩佐昌暲先生的电邮，告诉我一个足够让人充满期待的消息：周作人的后人保存着郭沫若给周作人寄来的“未公开的明信片”。

早些年，我先是通过对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的整理，后又借助对郭沫若的游学家书的校勘注释，接触到一点有关郭沫若、周作人之间的往来资料，但终究所知有限。这次，岩佐先生受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先生之托，向我详细介绍了周作人后人围绕这张“未公开的明信片”的考虑：由于郭沫若的著作权尚在保护期内，明信片的发表应事先征得郭沫若著作权人的同意，同时希望郭沫若的后人也能帮助收集周作人致郭沫若的信函（照片）。周吉宜先生又特别附上一句说，对方如果没有信函的存留也无妨，我们也愿意向后人提供这张明信片的照片，请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帮助表达这些想法。

这番考虑着实是慎重而又充满诚意。诚如周吉宜先生的推测，我们在郭沫若生前留下的来信里，没有见到周作人笔下的东西。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收到的来信被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遑论流亡日本以前，这自然是由郭沫若的生活轨迹所决定的。感谢周家后人的理解。

此前，我曾无数次地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过各种活动，竟一直没有机会和现代文学馆的周吉宜副馆长，这位博物馆的同行相识，真是阴差阳错，好在如今有缘于岩佐先生的从中沟通。

我和周吉宜持同样意见，同意把这份不可多得的史料——郭沫若 1936 年初寄给周作人的明信片交给岩佐先生主持编辑的《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报》发表。

2018 年 12 月 2 日

## 关于郭沫若致周作人的贺年明信片

周吉宜

关于郭沫若先生致我祖父的贺年明信片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因没有做过研究，不敢谬发议论。适蒙岩佐先生诚恳邀稿，思忖于情于理均难以推辞，故略记事情的缘由聊以塞责。这枚贺年片能够发表为大家所知晓，实在也是缘于一个巧遇。

今年2月，我和女儿周一茗应邀参加九州大学中里见敬教授主持的《〈春水〉手稿与日中文学交流—周作人、冰心、滨一卫》国际研讨会，在会场里与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岩佐昌璋先生不期而遇，匆忙之中没有很多交流。会议后期，岩佐先生引领与会者在校内参观，介绍郭沫若先生当年在九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听着岩佐先生的讲解，看着种种展示的物品和图片，不禁为日本学界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史料的重视所感动，大概也因为这个缘故吧，我忽然想起家里有一枚郭沫若先生1935年从日本寄给我祖父的贺年片。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岩佐先生，同时告诉他，我和家人都认为史料是应该为学术研究所用的，我们可以无偿的向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提供明信片的照片，但是作为文字和书法作品，其著作权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和郭先生的后人没有联系，解决这个问题稍有不便。岩佐先生当即表示非常高兴知道这个消息，十分赞同我们的想法，研究会和他本人与郭沫若先生的女儿很熟悉，他愿意出面进行联络。

研讨会结束后我们返回了北京，不久，经岩佐先生联系，郭沫若先生之女郭平英女士给我打来了电话，结果是一拍即合—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郭女士还提出希望把这个贺年明信片收入编辑中的郭沫若书法图集，我们也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不久郭女士委托专人携设备对这个贺年片进行了扫描，我们也如约向岩佐先生提供了照片。

关于前文提到的“巧遇”，到这里便已经说完了。但是关于这枚贺年片的经历，还可以再说几句。

周作人先生是很重视保存信件的，他保存了自1917年移居北京后收到的几乎所有信件。但是这枚贺年片和数万件其他信函，却在1966年文革中遭遇了“红卫兵”的暴行，能留存到今天实属偶然。“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闯入周作人先生家中打、砸、抢，人被殴打，家具被掀翻，榻榻米被拆开，文稿信件被抛撒满地，“红卫兵”们踩在上面走来走去。后来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运走，腾空的房间里住进了我们不认识的人。就这样，周作人先生的所有财产包括这个明信片被抢掠而去，下落不明。文革后我们不断地寻找和追索，终于在二十二年后从北京鲁博的藏品仓库里找回了包括信件在内的部分遗失物。我们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被鲁博“收藏”的全部，也不知道因文革浩劫信件损失了多少，但知道如今各位看到的这枚贺年明信片，是幸运地包含在被找回的信件中了。

谢谢岩佐先生给我机会讲述这个贺年片的故事。

2018年11月29日 北京

## 从郭沫若致周作人的明信片读出的史事

蔡震

郭沫若与周作人在 1934 年夏季周氏赴日期间互有往来，这在《周作人日记》、《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和郭沫若的日记《浪花十日》中都是有记载的。这应该也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有关二人直接交往的仅有的史料，但二人之间是否有通信联系，不得而知，在此之后是否仍有往来亦没有下文。这一纸初次披露出来的郭沫若写给周作人的明信片，当然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它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两个信息：

其一，郭沫若与周作人曾有过互通书信的交往。1934 年 7、8 月之后，他们仍然保持了书信联系。

此明信片首句谓“接到贺年片”，显然，这是郭沫若在 1936 年 1 月初接到周作人贺年片后所作的回复。那么按常理应该可以断定，二人在之前的 1935 年元旦之际，是有过祝贺新年的通信的。而往后的 1937 年元旦，大概也不会中断了这样互致新年的问候。至于在贺年之外，他们是不是还有其它往来信函，当然要有实物或其他史料印证才可以做出确切的判断。但以周作人 1934 年“小寓江户”期间与郭沫若往来的情形（请郭介绍结识并拜访文求堂田中庆太郎）而言，至少在那期间或其后一段时间，应该是通过信函的。

其二，郭沫若与周作人的书信往来，应该不只是单纯的礼节性问候，而有文友相交的内容。

如果仅仅作为新年之际互致问候，郭沫若写给周作人的这纸明信片的披露，也只能说确认了他们二人有过书信往来的史实。但明信片上所言之事，即，关于鱼形拓（片）的文字，却让这一次贺年往来的信函在礼节性问候之外，传递了更多的历史信息。

据明信片所写，周作人寄给郭沫若的除贺年片之外，应该还有一鱼形拓片。这当然是关于贺年之外的事情。周氏何以邮寄了这一纸拓片？不会毫无因由。是他本人特意邮寄的，还是应郭沫若索求而寄？我以为应系后者。这大概与郭沫若此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丙子の字に就て》有关。这篇文章以日文写成，发表于《书道》杂志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1936 年 1 月 1 日）第五卷一月号。《书道》为泰东书道院所办月刊<sup>（注 1）</sup>。郭沫若所作文章应系约稿，因为 1936 年以干支纪年为丙子年，该刊显然有意刊出一篇以此为话题的文字。《丙子の字に就て》从字源的演进变化解读了“丙子”二字的本义：“‘丙’的原义是（鱼之尾），‘子’的原义是人间的赤子。”更为有意思的是，刊载该文的《书道》一月号杂志的封面设计，在刊名的两侧对称绘有两条鱼形刻纹。



图为《书道》杂志1936年1月1日号封面。在刊名的两侧对称绘有两条鱼形刻纹。摘自蔡震著《在日本期间日文著述考》：《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1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郭沫若的文章作于1935年11月27日，他在文中认为《尔雅·释鱼》解“鱼尾谓之丙”，是“极原始的象形文字，恐怕还是渔猎时代图绘文字的残蜕呢”。那么他一定想找到相应的原始鱼形拓片来配合文字（譬如，文中写到殷周以干支记日，即用了一张殷契卜辞的图片），但手边一时不得。所以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郭沫若在某次通信中向周作人提及此事，于是周作人找寻并给郭沫若邮寄了一鱼形拓片。

不过遗憾的是，周氏此信寄到日本时，《书道》已经出版了。又或者周作人所寄拓片的“鱼尾只有半边”，不适合刊用。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郭沫若寄给周作人的这一纸明信片的书写内容，清晰地表明，二人的书信往来应该不局限于礼节性的彼此问候、致意，他们大概能如文友一样的书信交往。或者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交情，郭沫

若后来在1938年闻听周作人欲包机从北平南下的传言，即撰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并在文中对于周作人写下那番情真意切的话语。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与国内许多学者朋友、文友，都是通过互通书信的方式开

始交道往来，并一直保持了很好的朋友关系，譬如，与容庚的交往。而与董作宾的交往甚至是在“十年神交”之后方得“握手言欢”（注2）。书信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交友的重要方式，当然也是我们了解郭沫若这一时期生平活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等最为重要的文献史料。如果这一纸郭沫若致周作人的明信片具有了这样的涵义，也就让我们有了更大的期待。我们期待郭沫若与周作人之间还有其它往来书信存世，并能发掘出来。

### 编辑部注释

1) 泰东书道院是1930年创立的书法家（日本把书法称做“书道”）社团。其目的是通过书法的普及和提高裨补国家的文化。其会则规定院总裁为皇族。东久邇宫（天皇的弟弟）为总裁。昭和时期除泰东外还有东方书道会（1932年），大日本书道院（1937年），此三个社团分昭和书道界（近藤高史《明治·大正·昭和书道史年表》木耳社，1985年）。

2) 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的1929年8月以“未知友郭沫若”的签名给容庚（金文专家。1894-1983）写信请教。从此开始书信交道，可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才是1946年。郭沫若与董作宾（甲骨文，古文字学专家。1896-1963）的交流1932年夏秋间开始。当时郭着手执笔《卜辞通纂》，为了执笔的需要向董帮助提供史料。董答应。郭很感激，从此开始书信交流。但郭回国后两人没见。1942年才在重庆初见。两人都高兴。董作宾后来写“三十一年春，访郭沫若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此话见于《“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彦堂与鼎堂》（《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3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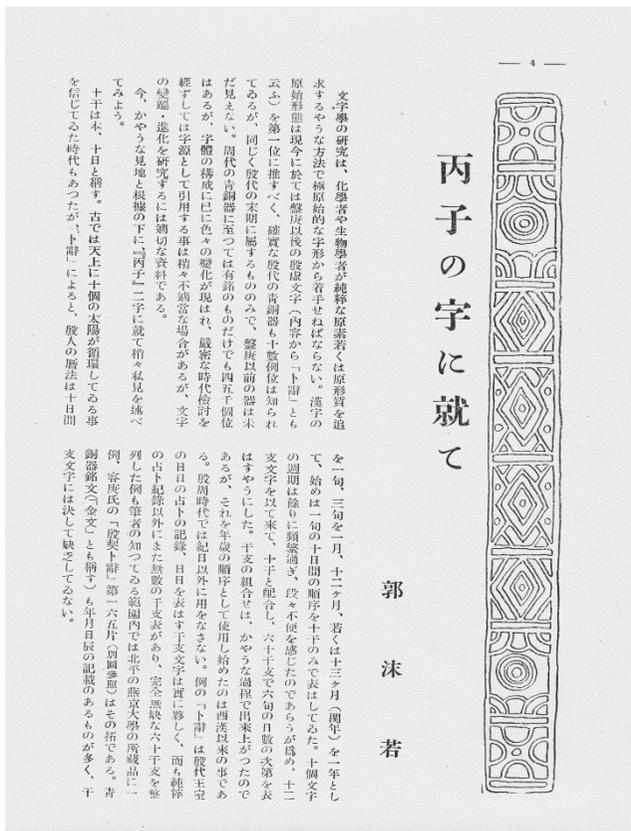
# 《丙子の字に就て》

蔡 震

作于1935年11月27日,发表于东京《书道》月刊1936年1月第5卷1月号。

《书道》月刊由日本泰东书道院出版部初版发行,创刊于昭和七年(1932)二月(1)。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来往颇多的中村不折是该刊编辑部的“协议员”。昭和十一年(1936)以干支纪年是丙子年,编辑部因以邀约郭沫若做了这篇文章。郭沫若在文中解“丙”字的愿意是“鱼之尾”,“子”子的愿意是“人间的赤子”。有意思的是,该期《书道》的封面设计,在刊名两侧对称绘有两鱼形刻纹。

殷尘(金祖同)后将该文译为中文,题作《释丙子》,刊载于上海《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10-11期合刊。但译文颇多疏漏。译者自己亦谓:“前年在日本时试译,不但文字风趣全失,间亦有失原文本意者。”在《说文月刊》刊出时,因无原文对照,故“无从重校一过”。



图为在《书道》月刊上登载的郭沫若用日文写的《丙子丙子の字に就て》原文。文章与图摘自蔡震著《在日本期间日文著述考》：《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1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付：蔡震记有关两人交流的史料性文章/编辑部选

## 周作人拜访郭沫若

郭沫若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从踏进文坛后，与鲁迅之间的笔墨之争几乎就没有中断，后来彼此之间也都有表示过仰慕之意，但终是未能谋面。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称颂“大哉鲁迅”是由衷的表扬。而郭沫若与周作人在其沦为汉奸文人之前，从未有过文字上的齟齬。抗战爆发之初，郭沫若还写过一篇《国难声中怀知堂》的文章，称赞周作人是不多的几位“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之中一人。他们二人是有过面交之谊的。《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中涉及郭沫若与周作人见面的记载有两条，但一条语言不详，一条为误记。郭沫若曾有《浪花十日》一文，记述的是他在1934年暑期（8月）到位于海边的浪花村小住十天的经历。文中提到徐耀辰（祖正）致信说，小寓江户（即东京）的周作人意欲一见。《郭沫若年谱》据此作了记录，但两人是否见面则不得而知，因为郭沫若没有写到。另一条谱文在1936年2月的本月事项下，记载“与周作人晤面”。所据史料为陶亢德的《知堂与鼎堂》一文中提到的1936年2月27日致陶亢德的信，信中有“鼎堂相见大可谈”句。这是一个误记。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和《周作人日记》可以澄清、纠正这两条记载。

1934年8月14日、郭沫若致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一封信中写有：“今日周作人、徐祖正两先生来访，谈及尊处，颇愿识荆，嘱为介绍。拟于十七日午前奉访，并欲瞻仰观潮楼，不识尊便如何。”8月18日的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昨日偕周、徐两君奉访，多蒙恳意招待，归时更蒙嫂夫人送至御茶水，感激感激。”<sup>②</sup>。由此可知，周作人在1934年8月14日曾到郭沫若在市川市的寓所拜访他，郭沫若复欲17日陪同周往访田中庆太郎。《周作人日记》亦记载有17日访田中事：“上午，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驮木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钵の木洋食’田中夫妇为主人。下午一时半回寓。”<sup>③</sup>。森氏即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森鸥外。

周作人这次到日本是陪同日本籍夫人回家探亲，但他又以学者身份出现在东京，所以接待他、访问他的大多是文化学术单位和文化人，比如日华学会、明治文学谈话会、《中央公论》社等。郭沫若由是生出感慨：“岂明先生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黄帝的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sup>④</sup>。

根据周作人日记、年谱等有关资料可知，1936年2月时，周作人身在北京，没有可能与郭沫若晤面。

（《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第364-3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

### 注释

- ① 《国难声中怀知堂》，《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第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 ②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第152号、153号，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 ③ 《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
- ④ 《浪花十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3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 1934年周作人郭沫若东京会晤

吴红华

黄唯翻译

五四新文学草创期，留日学生的创作活动非常突出。对此，郭沫若曾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桌子的跳舞》）。周作人和郭沫若都曾留学日本，在二十世纪初代表中国文坛的两大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中各自担任领袖角色。周作人（1885-1967）于明治末期在日本生活了5年半，郭沫若（1892-1978）则于大正初期在日本度过了10年的留学时光。

之后郭沫若因受国民政府通缉，于1928年至1937年期间被迫来日本政治避难，他一生总共在日本生活了20年。战后周作人因与日本协作被问汉奸罪，在南京被监禁了3年之久。二人的家庭状况也很相似，他们的妻子都是日本人，并且子女甚多，都担负着赡养大家族的义务。尽管他们境况类似，但因留日时段的不同，对日本文化的吸收也有差异。再加上二人自身的生长环境、性格才情、文学思想等各种因素，他们虽然活跃于同一时代，但关系可谓生疏，在1934年两人会面之前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对立关系。

## 一、与文学研究会的对抗意识

始于1917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舞台迅速扩大发展。鲁迅及周作人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大量译作、文学评论、小说等，作为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旗手广受关注。而郭沫若稍迟一步登场。他的代表作《凤凰涅槃》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见报。由于当时他还在日本学医，没能在初创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线崭露头角。

尽管如此，郭沫若和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创立了创造社。他们受大正时期日本流行的浪漫主义、反现实主义、新心理主义，以及之后的普罗文学等的影响，开始标榜打破偶像，继而推动革命文学，陆续发表了诗歌、小说及散文等。在《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广告中他们更是直言“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表明了他们对抗既成势力文学研究会的态度。

周作人正是郭沫若等人眼中垄断北京文坛的“一二偶像”。郭沫若曾因为在1920年10月10日的《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中，总编辑李石岑将他的诗剧《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人的译作之后而深感不满，立马写信给李石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sup>[1]</sup>，更是表现了其对周作人的对抗心理。

对于创造社初期成员张凤举和徐祖正后被北京大学所聘，和创造社疏远的原因，郭沫若

---

<sup>[1]</sup> 1920年11月上旬郭沫若写给李石岑的信中可见处子和媒婆的言论。并在11月14日写给郑振铎的信中公开解释了这两个词。《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四号

也在《创造十年》中颇为不满地写道：“重要的原因怕还是那一‘战’罢？那一‘战’把我们北大教授周作人导师得罪了，倒是千真万确的。”<sup>[2]</sup>。

其实有关刊载顺序的争议，在1933年创刊的杂志《现代》中也有发生。郭沫若受时任编辑施蛰存所求，承诺为该杂志连载他的散文《离沪之前》，然而在他得知《现代》第四卷一号中将自己的连载排在了周作人的《苦茶随笔-性的心理》之后，就马上要求中止连载。施蛰存赶忙安抚郭沫若，为不影响杂志发行，还暂时登出了连载中止的预告。虽然最终郭沫若被说服，连载没有受到影响，但施蛰存仍不得不在第四卷第二号的《编者赘语》中特别声明以照顾郭沫若的面子。而周作人的《苦茶随笔》续篇之后也就不在《现代》刊载，都交给了《大公报》以及施蛰存主编的另一份杂志《文饭小品》去刊载了。

然而这些争端追根究底也只不过是席次之争，并不能算得上文学理论层面上的争鸣，所以周作人对此并未回应。但是随着鲁迅的左倾，最终上海文坛大联合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后，周作人也发表了一些讽刺左翼文艺运动及鲁迅私生活的文章。在文章中也有言辞较为激烈地批判文艺中的主义论争，反对单纯化的理论和标语式的言辞表现。他批判郭沫若等的创造社以及转向左翼的鲁迅等为迎合时代潮流的“载道文学”，并与林语堂等陆续发表“言志文学”的闲适小品，提倡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示的文学史观。

发表于1930年3月的《金鱼》<sup>[3]</sup>就是对文坛现状深感危机的周作人所发出的重要信息。《金鱼》是周作人草木虫鱼系列的初编。周作人用独特的委婉笔触揭露了身为观赏用小动物的金鱼最终只能依附饲主而生的本质，意在讽刺上海的普鲁职业文士们最终也需要依靠贵人豢养，也只是某阶级的宣传道具罢了。可以看出周作人试图通过《金鱼》一文隐晦地批判标榜革命文学的左翼人士，并表明自己坚守的文学观念。但周作人的批判并不是针对特定的人。而对指责《金鱼》的言论，他在写给黎锦明的《半封回信》<sup>[4]</sup>中这样写道：

老实说，我对于郁达夫、郭沫若诸位先生，一直有相当敬意，但看上海滩上的文坛战讯，好像是许多的剪刀店，不知为什么那样地在那里混战恶斗。我连这个都不能明了，更岂可冒昧地窜进核心去，无端被人家认为某一集团的士兵？我于许多事情确也有许多意见，例如（1）文学有言志与载道两派，互相反动，永远没有正统，（2）文学没有什么煽动的能力，（3）文士的职业是资本主义的私生儿，在合理的社会人人应有正当的职业，而以文学为其表现情意之具，有如写信谈话一样，这就是说至少要与利得离开。现今文学的堕落的危机，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于他的营业化，这是落到了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再也爬不上来。

从以上叙述中可知，他的批判也不过出于道义伦理，并不能算得上是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探讨。所以就有关周郭在当时文坛上的理论层面的对立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

[2] 《郭沫若全集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P170

[3] 周作人《金鱼》（《青年界》创刊号 1931 年 3 月 10 日）1930 年 3 月 10 日执笔

[4] 《周作人散文全集 5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4 月）P628

## 二 在日本会面

这样的两个人 1934 年在日本见面了。

1934 年周作人偕同妻子回日本探亲，这是他自 1919 年以来的第二次访日。适时正值大学的暑假，周作人在日本停留了 2 个月左右。当时周作人的北大同事、同时也是创造社成立初期的成员徐祖正（耀辰）也在东京，徐陪同了周作人访日的整个行程。也正是徐祖正引见了他们两人，两个分歧社团的领袖人物在日本会晤，当时很受媒体关注。

《周作人日记》<sup>[5]</sup>中有二人在东京的三次会面记录。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是 7 月 30 日，“郭沫若君同四女来訪耀辰、共談良久而去”。

关于第一次见面的经过，在郭沫若《浪花十日》中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记录。当时郭沫若一家住在千叶市川市，每年暑假都去千叶的浪花村避暑，就在出发前的 7 月 30 日下午，郭沫若带着四女儿前往周作人等留宿的菊富士酒店拜访徐祖正，并与周作人作了交谈。

至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会面，在《浪花十日》8 月 6 日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天郭沫若收到了徐祖正寄往浪花村的信，信中说周作人想约见面。该节后续部分郭还写了一段牢骚话。

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烈士宪兵。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sup>[6]</sup>

此时郭沫若正迫于蒋介石政权的追捕而亡命日本，然而日本也正取缔打压左翼活动家，郭沫若也被日本刑警视为危险人物，时时受到监视。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转化为对周作人的不满，而发了这些牢骚。

8 月 14 日的《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转乘电车至市川须和田宅、访郭沫若君、下午回寓已四时”。这日周作人特意拜访郭沫若，是为了请当时与郭交往甚密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引见著名的西洋画家·书法收藏家中村不折<sup>[7]</sup>。周作人、徐祖正和郭沫若三人约定在 17 日于文求堂见面，郭沫若马上就写信给田中告知了此事<sup>[8]</sup>。

周作人之所以想见中村不折，据称是因为周的好友钱玄同对中村不折和郭沫若等人进行的汉魏书法·篆刻文字的研究很感兴趣，但仅因为这个原因就特意造访实在有点牵强。周作人应该十分了解郭沫若在古典史学研究领域受人关注以及在日本的困难处境，他也许为了解开同郭沫若一直以来的各种误会，并觉得有必要同郭就日本文坛的情况交换一些意见而提议这次见面的吧。

《周作人日记》8 月 17 日写道“上午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亦来、同

---

[5] 《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 1996 年）

[6] 《郭沫若全集 1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P392

[7] 中见里敬「钱玄同致周作人书简」—围绕钱玄同、周作人、中村不折之收藏的日中文化交流」（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开发室年报 2018 年 7 月）

[8] 郭沫若写给田中的信（1934 年 8 月 14 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P286

往千駄木町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鉢の木洋食、田中氏夫妇为主人、下午一时半回寓”。17日三人先到文求堂，因田中不在，郭带周徐二人到千駄木町的田中家（森鸥外旧宅观潮楼）。田中请三人入府并给他们看了自己珍藏的书籍。<sup>[9]</sup>午饭时间，田中夫妇招待客人到大学附近的西洋餐厅“鉢之木”共进午餐，席间交谈甚欢。当晚田中还同周作人一行参加了日本诗人会，会毕送周回酒店，当晚写信给中村不折。18日，田中拜访周作人，并告知已约定20日造访中村府。

关于此后两次的见面，《浪花十日》中只记录了收到徐祖正的信件，并未提及之前7月30日的会面和之后同中村不折的交往。经过第三次会面，我认为周作人和郭沫若之间应该有许多对话，但不知为何二人都对会谈内容避而不谈。关于二人的微妙关系，或许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 三、会面后二人的变化

两人东京见面以后，双方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郭沫若对于之前猛烈攻击周作人的姿态稍有控制。另一方面周作人也在文章中更多地提及郭沫若。

1935年，周作人在《科学小品》一文的开头，提及了收到商务印书馆赠送的郭沫若翻译的H.G. 韦尔斯等写的《生命之科学》，并称赞郭沫若身为医学生同时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很胜任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郭沫若于1929年开始翻译巨作《生命之科学》。之后因书店失火失去了原稿，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翻译工作。前文中提到他和周作人见面的1934年在浪花村时就正在翻译这部巨作。当时郭沫若不知有否提及此事，但周作人收到赠书后仔细阅读了郭沫若的译文，并举了具体的例子说明其译文的价值。周作人的这篇书评很值得一读。在周的书评《科学小品》的后半部分，周作人以他特有的笔触，翻译了自己喜欢的汤姆生的《落叶》中的一段，对当时文坛流行的科学小品下了自己的定义，并以《落叶》为例进行了说明。该文有周作人特有韵味。可以看出两人的良好关系相辅相成，成就了这篇趣味盎然的文学书评。

同年，周作人和郁达夫各负责编辑散文集，周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收录了郭沫若的七篇散文。可见周作人对郭沫若的文学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作人在同年发表的《谈方姚文》，以及次年的1936年发表的《朴丽子》中都提及了郭沫若的历史小品《孟夫子出妻》。可以说，正如同对郁达夫的评价一样，周作人对郭沫若的突出表现也十分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考察周作人对郭沫若的态度时，还应该注意周作人访日时，曾受左翼作家藤森成吉邀请之事<sup>[10]</sup>。

其实周作人当时一度谢绝过藤森成吉的邀请，但最终还是接受邀请，于8月21日造访了藤森宅，和日本普罗作家们见面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神近市子、德永直、秋田雨雀、渡边

---

<sup>[9]</sup>周作人《十竹斋的小摆设》（1935年）一文中，提到中国唯一一部王孝慈所藏的原刻珍本《十竹斋笺谱》现为田中所有，自己曾在田中处看过这部珍本，并说明了鲁迅等人复刻这部珍本的价值。

<sup>[10]</sup>刘岸伟《周作人传·一个知日派文人的精神史》（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1年11月）

顺三、岛田和夫、江口涣等人<sup>[1 1]</sup>。藤森成吉曾在郭沫若六高时代教过他德语，也许这天他们的话题中也会谈及郭沫若。

无论如何，周作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拒绝同普罗文学作家们的交往。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他致力的“新村运动”、坚决反对强权和统治的自由精神，使他无法完全否定左翼文学。

1937年，郭沫若不顾家人的反对，单身秘密回国投身抗日运动。与此同时，他写的给周作人的书简《国难声中怀知堂》<sup>[1 2]</sup>中，使用了如“如可赎身兮，人百其身”等郭沫若特有的夸张表现，呼吁周作人离京南下。

根据陶亢德的《知堂和鼎堂》<sup>[1 3]</sup>一文，对于郭沫若的呼吁，周作人回以“且感且愧”。对周作人来说，携家带口离京绝非易事。但是及至周作人在沦陷区担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甚至是傀儡政权的教育督办等要职时，两个人便分出了明暗。

#### 四、二人的晚年

在亡命日本期间，郭沫若寄给出版社总编辑和友人们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要求对方支付稿费的交涉，可见当时郭沫若一家的生活已经困顿到了什么地步。

然而该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其中对古代史研究、甲骨文和金石文的研究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另外他的历史小品《豕蹄》、诗剧、《漂流三部曲》等，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他还尝试了各种翻译和自传体散文。这些都是他为了养家，笔耕不辍的成果。这个时期他写给前文提到的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的信中也频频提及经济状况。田中为了救郭沫若于困顿，陆续帮他出版了许多作品。《石鼓文研究》（1933）、《古代铭刻会考》（1933）、《古代铭刻会考续篇》（1934）、《金文余释之余》（1935）、《西周文辞大系考释》及《西周文辞大系考释图录》（1935）等研究书籍都先后由文求堂出版。另外如《我的幼年》、《北伐途次》、《创造十年》、《黑猫与塔》、《黑猫与羔羊》等自传体散文和《生命的科学》、《日本短篇小说集》等翻译作品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

郭沫若的生活在建国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曾经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与共产党有并肩作战的经历，建国后他先后担任政府要职。他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全人代常务副委员长、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在文学及史学领域担任指导职位。反右派运动之后，由于他积极进行自我批评，被作为知识分子成功思想改造的例子而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而周作人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汉奸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晚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悲苦生活。周作人出狱后受过去弟子和友人的资助，勉强在北京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建国初期，周作人受命翻译古典希腊文学及日本古典文学，靠着翻译的报酬赡养大家庭。及至

---

[1 1] 参照《周作人日记》1934年8月21日

[1 2] 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1937年8月30日

[1 3] 陶亢德《知堂与鼎堂》（《古今》半月刊1943年20·21合订本）中引用周作人的信：

赐信均收到。鼎堂相见大可谈，唯下笔时便难免稍过，当作个人癖性看，亦可不必计较，故鄙人私见以为互訐恐不合宜，虑多为小人所窃笑也。偏见必必有当，聊表芹献耳。

十五日所寄刊物四册于今日收到，至为欣喜，鼎堂先生文章得读，且感且愧，但亦不敢不勉耳。一九三七年十月二五日

文革开始，出版社不再预付他稿费，他的生活也开始愈发捉襟见肘了。晚年他靠着给香港的鲍耀明、曹聚仁以及松枝茂夫等日本友人寄稿和书籍，来换取必须的参考资料、药品，以及牛油、砂糖等日本的调味品和嗜好品。

在这样的穷困生活中，周作人翻译了大量作品。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翻译或校订出版了《日本狂言选》《石川啄木诗歌集》《古事记》《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平家物语》《枕草子》《徒然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全译伊索寓言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三集》等作品。对于一个已经年过七十的古稀老人来说，这样繁重的工作量令人咂舌。最终他却毫无尊严地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周作人在晚年也曾提及郭沫若。鲍耀明曾寄给他赵聪的《五四文学点滴》，他阅读后他在给鲍的信中这样叙述了自己的感想。

书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省略）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sup>[1 4]</sup>

从这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并没有对郭沫若有特别的坏印象。只是对郭沫若的夸张表演，没有一以贯之的主张和主义的态度无法苟同。也许这才是周作人对郭沫若最确切的评价。

（此文第 20 号原载时的日文题名为《知堂·周作人与鼎堂·郭沫若》，现按作家的意思改题名）

#### 本期执笔者（包括“存目”文章执笔者、翻译者）

郭平英	原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周吉宜	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蔡震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
岩佐昌暲	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藤田梨那	国士馆大学教授
吴红华	九州产业大学教授
黄唯	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
刘岸伟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武继平	公立大学法人福冈女子大学教授
中里见敬	九州大学教授
顾伟良	弘前学院大学教授

[1 4] 参见《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P356~357